

现代汉语在深层上如何制约和规定着现代文学的品格？

为什么要转型？往哪里转型？我们现在的类型是什么样的？理想中的类型又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转型？

为什么晚清白话文运动没有导致新文学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却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是什么关系？

现代汉语与 中国现代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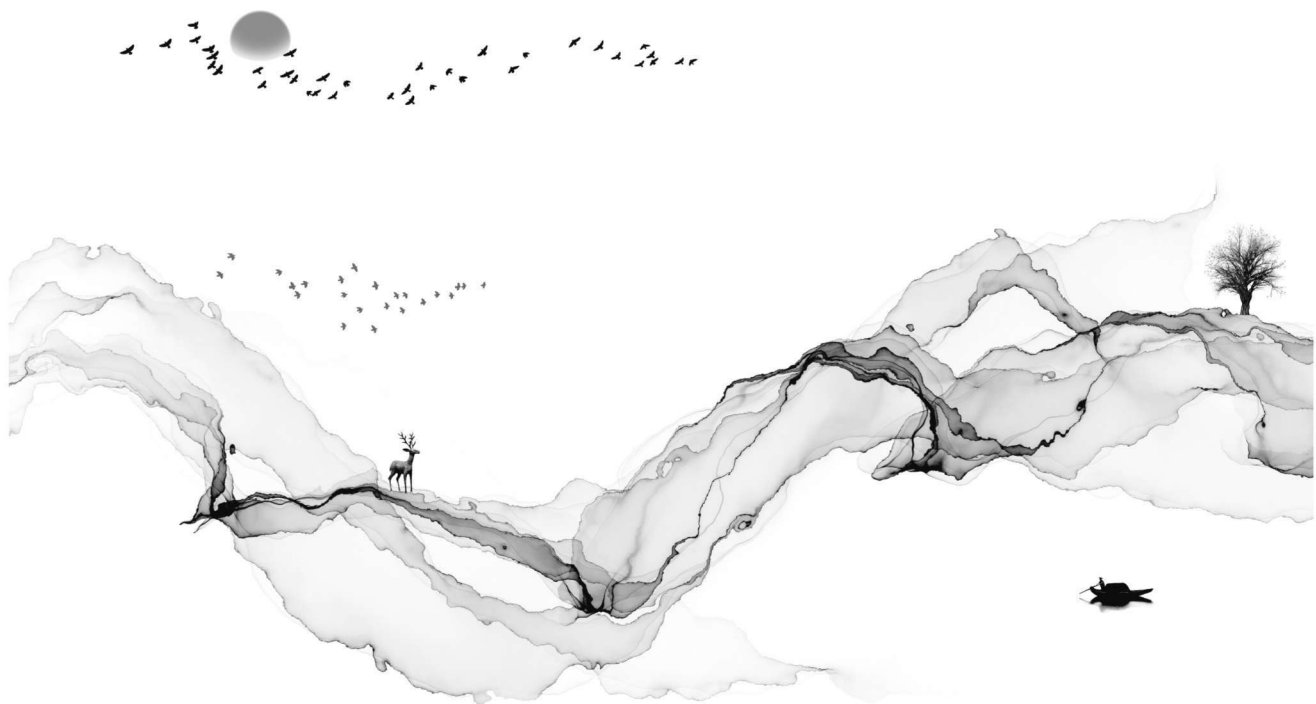
高玉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汉语与 中国现代文学

高玉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品格,对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本书的基本观点: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符号,同时还是思想本体,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器”的层面和“道”的层面。现代汉语的确立也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的变革,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翻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层关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高玉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ISBN 978-7-313-23918-1

I. ①现… II. ①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99400 号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XIANDAI HANYU YU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著 者:高 玉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印 制: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56千字

版 次:2021年5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23918-1

定 价:9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9.25

印 次:2021年5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31011198



鲁迅在 1919 年 3 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344 页。）这段话既有超前预见性，又有现实普适性；既是“五四”时代中国社会的写照，也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整体概括；既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文学。

从横向比较来看，自白话文革命至世纪末的后现代浪潮，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文学从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的语言革命到后现代用了七八百年时间走过的路程。西方文学在这期间先后出现的各种流派、思潮、观念、方法，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坛几乎同时登场。从纵向发展来看，宋诗派的余绪，现代新儒家的崛起，和鸳鸯派小说、新武侠小说、洋场文学、革命文学乃至种种现代、后现代思潮流派并列而存，更是熔古今于一炉。可以说，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特点就是尝试，如神农氏尝百草，古今中外尝了个遍。这期间，固然充满了尝试中的活力、进取、开拓、反思，却也不免“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344 页。）对这样一段极其复杂的文学史进行总结，是非常困难的。同

时,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又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历史上凡是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人物、制度、观念、模式,乃至文学语言、形象、观念意蕴都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转折点。然而中国的情况太特殊,特殊之处就在于,在20世纪中国现代转型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又是一波三折、变化多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工农兵运动、新中国的建立、两岸四地的隔离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代化高潮等,每一次变革又是对前一次变革的扬弃,并深刻影响了同时期中国文学的走向。这样,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好像弯了无数道弯的黄河,它的中轴在哪儿呢?这中轴不是一般的所谓新传统,所谓现代性,而是新传统与现代性之源。这个“源”不随一时风向的转变而转变,而断裂;它始终作为“本体”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无穷无尽的养分。正是因为它,中国文学才得以实现现代转型,从此成为一个有别于古典文学的崭新世界,而且不论怎么“风云变幻”,始终保持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我们只有找到这个“源”,才能明白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高玉根据博士论文丰富、扩写的这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正是这样一部回到历史的原点的研究专著。它论述了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确立的本体性意义,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整体特征。“五四”新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这种改变有赖于“五四”引进的西方文化、文学和思潮。然而,使中国文学发生现代转型的不是具体的哪一派哪一门,而是一种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时代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既是多元的,又有区别于古典文学、文化、思想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是什么?就是现代汉语。“五四”之后,又有多次社会变革影响新文学的面貌,如1949年后中国大陆地区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和革命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中国港、澳、台地区时而新潮文学时而乡土文学时而众声喧哗、交融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地区风行于前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等逐渐消隐,“反思”“寻根”各种先锋、新潮、现代后现代文学如潮汹涌。这样变化莫测,我们仍然说,这都是现代文学,都

是中国新文学,不是别的什么或“西”或“古”的文学。那么这背后的共同性又是什么?同样是现代汉语。正如这部论著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汉语不仅仅意味着新的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文化的问题本质是语言问题。古代汉语从根本上不能容纳新思想。高玉将鲁迅的文言著作或归入古典文化范畴,或归入新旧之间的过渡地带,这种观点非常独特。的确,即便是《摩罗诗力说》这样的观念翻新之作,如果始终被置于文言文的语境之中,迟早会被人拿去再做一篇《论“摩罗诗力”与“汉魏风骨”之比较》之类的文章,并最终得出“‘摩罗诗力’差‘汉魏风骨’多矣”之类的结论,从而最终在古典文化系统中将其精神实质渐渐吞噬殆尽。而倘若将“摩罗诗力”等文论术语转变为富有魅力的现代诗语,则不仅是表达工具的改变,更是整个思维的改变。在新的现代语境下。语言就是有这样大的力量。不同的符号系统发展出不同的话语方式,不同的话语方式又意味着权力,在这样的权力之下,往往是“话说人”而非“人说话”。要想做到真正的“人说话”,就必须突破旧的语言束缚,好像石破天惊一般,这样才有新的宝石出现。正是现代汉语这个“源”,这个仍然在源源不断喷射着水流的“源”,使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这条多支流、多曲折的纷繁水系具备了可以全方位把握和研究的整体性。同时还应看到,将现代文学的发生上升到语言本体的高度,与确立现代文学的多元传统和特性是内在统一的。现代文学的多元性统一于现代汉语,而现代汉语作为多元背后的“存在的家园”为多元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许离新文学应有的巅峰还存有一段差距,即所谓总让不少人有“半熟”之感,但是它对现代汉语的形成与确立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足以使其具有古典文学“元典”形成期那样的崇高地位。

当前学术界有不少贬低甚至否定我们的新文学的观点。现代汉语、新文学所带来的“语言断裂”“文化断裂”是这一观点的重要论据之一。我们并不否认文言文凝练含蓄和充满言外之意的空灵。这一切都可以化为我们建设新的现代汉语的养分。但是我们更需要从宏观上,从整个的语言符

号系统及其所负载的文化思想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一问题。这部论著对晚清白话文学运动和“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之间差异所做的分析、对古代汉语系统内的翻译文学由于缺乏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支撑所导致的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归化的分析,均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语言变革是一切文化、文学、思想变革背后所必需的更为根本性的变革。而以胡适的《关不住了》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为个案所做的语言学实证分析,更是从正面论证了新的语言体系的巨大生命力和对新思想的巨大表现力。

这部论著尽管可能还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但是它对于新文学的研究具有真正的,而非虚饰的价值。它填补了新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薄弱环节;它提供了我们看待新文学史书写的新的思路;它从学理上捍卫了中国新文学的伟大意义和价值。这部论著文风朴实、材料翔实、逻辑严密,在史料的挖掘上,在问题的分析上都有新发现、新见解。尤其是回到历史发生的原点去探源的治学方法更值得提倡。高玉从1997年开始的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期间,虽然经济条件很差,但他省吃俭用,买了很多书,用以刻苦治学。文如其人。他做人做文都是踏踏实实的。在充满浮躁浮华之气的今天,我们呼唤更多高玉这样的青年学者,也呼唤学术界能有更多这样学理基础和创造发现兼备的成果。

2003年元月



高玉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最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即将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首先对他表示祝贺。

高玉是黄曼君先生的博士生，2000年毕业。2001年他申请到我这里做比较文学博士后，当时他把他的简历和科研成果目录寄给我，我对他的情况大致有了些了解。他硕士研究生学的是文艺学，后来又读现当代文学博士。从科研目录上看，当时文章发表得已不少，且多比较长，刊物的级别也不低，文艺学方面的、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还有纯粹的哲学和文化学方面的文章，初觉得这有些杂，不过马上又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做比较文学，这正是长处。所以，我初步的意向是同意他进站。后来他通过层层考核和筛选，他如愿以偿地从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这应该说是实力的体现。

来我这里做博士后之后，我对他的为学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初次见面的感觉是，不多言辞，为人忠厚、诚信，比较学者气。后来我们每次见面谈论得比较多的都是学问上的事。我感觉他阅读面很宽，文史哲各方面的书，他都读，且多有心得。基本功扎实，知识储备比较好，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这对于他未来的学术发展将非常有利。

因为近来杂务一直比较多，《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稿子，我只

能很粗略地读一遍。语言与文学包括与文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课题,近年来,我在这方面做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高玉自己讲,他就是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以后,对我的研究感兴趣,并对我的一些观点比较赞同才来申请我的博士后的。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值得欣慰的事,作为一个学者,学术观点提出来之后,能得到学术界同仁的重视,引起人们讨论的兴趣,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至于是支持还是反对,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学术观点能得到积极的响应,这当然值得高兴,但遭到反对,也未必就不是好事,它至少会激励我更深入的思考。高玉赞同我的一些观点,我固然高兴,但即使他不赞同我的观点,我仍然很高兴,仍然会积极支持他进站。我一贯的态度,对于学生,我提倡他们应该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老师提出不同意见,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学生才能超过老师,才会“一代有一代之学术”。

就我对话语问题的研究,我认为高玉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很重要的,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现实也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提出语言本质的“道器”性,翻译本质的二层面性,这是很大胆的观点,富于挑战性。他关于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我也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对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检讨,对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之间关系的论述,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以及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之间关系的论述,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与现实之间背离的问题的分析,都非常有见解。读完之后,读者自会有自己的判断,我相信读者会同意我的判断。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学术专著,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他2001年曾以此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以“自选一般课题”的形式申报,这难度非常大。最后能通过一层层的筛选,获得通过,这也证明了专家们对他选题的肯定。就现在的论著成果来看,他应该说没有辜负评委们对他的肯定和期望。希望他博士后出站报告做得更精彩。

高玉嘱我为他的书写序,以上这些话是表达我对他的厚望,也是互勉。

2002年6月于四川大学文学院



绪论	时间、理论和问题意识	001
第一章	语言本质“道器”论	017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文化及文学转型与语言变革	029
	第一节 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029
	第二节 现代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044
	第三节 两次文学转型的语言学论比较	057
第三章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	071
	第一节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071
	第二节 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083
	第三节 “世纪末文学转型”的语言学质疑	095
第四章	“五四”白话文学理论再认识	107
	第一节 “五四”白话及其白话文学	107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晚清白话文学运动的 本质区别	116

第三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的本质区别	124
第五章	语言运动与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与现实	131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的理论	131
第二节	“五四”新文学的现实	140
第六章	“异化”与“归化”——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148
第一节	翻译本质“二层次”论	148
第二节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古代性”	157
第三节	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异化”	169
第四节	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归化”	178
第七章	胡适“学衡派”白话与文言之争及其文化意味	184
第一节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检讨	184
第二节	论“学衡派”作为理性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	198
第三节	胡适与“学衡派”在语言观念上的分野	209
第四节	胡适与“学衡派”在文化建设观念的分野	222
第八章	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系	231
第一节	鲁迅的语言观	232
第二节	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的关系	242
第三节	鲁迅文言作品的过渡意义	250

第九章 “纪元”与“开篇”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言学实证分析	260
第一节 《关不住了》——“新诗成立的纪元”	260
第二节 《狂人日记》——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篇之作	267
参考文献	277
索引	282
后记	285
中国台湾繁体字版后记	289
再版后记	292

绪论



时间、理论和问题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学科从发展壮大到现有的规模、成就以及影响,其繁荣的景象是其他学科所不多见的,这与一大批前辈学者、中青年学人以及更为广泛的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也与学科的勇于探索、勇于进取、大胆开拓、迅速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开放性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取得丰硕的成果和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弊端。这里,我试图从研究视角、时间划界、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等方面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反思。

一、研究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如何研究这复杂的现象,我认为,不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理论视角上,都应该多方面的。黄曼君先生在1990年初写过一篇题为《回归中的超越——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反思与辨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出,70年来对“五四”新文化的基本观念主要有四种:“一是主要从政治

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评价‘五四’”；“二是侧重于从文化思想、人的解放的角度来评价‘五四’”；“第三种‘五四’观是力图超越政治、超越思想启蒙，走出泛政治意识形态”；“第四种‘五四’观指的是现代新儒家对‘五四’的总体看法”。^① 这是四种“观念”，其实也是四种理论或“视角”，第一种是政治的视角，第二种是文化的视角，第三种是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视角。与第一、第二种视角不同，第三种视角明显是新潮方式，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广泛影响，这种倾向更为明显。第四种是中国传统视角。与第三种视角相反，它是保守的。其实，还可以从其他视角来审视和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接受学和阐释学理论来看，这是合理的，每一种理论或视角都有它充分的依据。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阐释、解说成后现代主义，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这是荒谬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可行的。同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但这不影响从传统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它，这实际上是从另一方位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人和人的社会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性质和内涵。所以，从政治、人学、文化学等“外在规律”上研究它，毫无疑问是深刻的。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有其内在的独特结构和发生发展规律，客观公正地、历史性地描述和解剖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本位性的。同时，运用某种理论成果，从一种新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及文学史，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可以非常深刻。事实上，从心理学、哲学、美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视角研究文学和文学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这里，理论既是一种深度，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工具，借助于这种工具

^①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与新文学主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389-394页。

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

在诸多方法、视角和理论之中,我认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是一个新的角度,目前,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为什么晚清白话文运动没有导致新文学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却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内在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是什么关系?现代汉语在深层上如何制约和规定着现代文学的品格?不论是语言学界还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未有人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追问。陈独秀、胡适等人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他们所提倡的白话与古代白话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所发动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语言变革与文学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而且在当时的语言理论及研究的现状下,他们不可能把这些问题论述清楚,也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追问。

从语言学即从深层的语言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笔者所查阅文献和翻阅材料来看,还没有这样的课题和研究。这与现代学术学科过于分隔有关,更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现状有关。中西方传统语言观都认为语言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工具,即语言工具观,这种语言观实际上把语言置于附属和次要的位置,所以就不可能从深层的语言学角度来追溯思想和精神问题。过去也有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的,但这和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实际上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形式进行研究,研究其语体风格、修辞手法以及写作技巧,这样就把现代文学语言问题让位给了写作学和语文学。语言既然是工具,那么它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因而即使想在这方面做文章的,也似乎无话可说,因为问题有限。但是20世纪,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认为语言即思想思维,语言即世界观,语言是存在

之家,不是人说而是“语言说”,话语即权力,语言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的联系等。从这样一种语言观来重新审视“五四”白话文理论、白话文学运动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全新的阐释。但现代语言学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却缺乏起码的运用和借鉴。只有少量的著作和文章对此有所涉猎,且明显缺乏语言哲学的深刻性。本书试图在充分吸收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哲学的成果的基础上,从一种新角度、用一种新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品格作全新的审视和阐释,从而弥补现代文学在研究上的某些缺陷。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有重大价值的选题,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选题,它将开辟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并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某种活力。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也是一次语言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深层上也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正是语言变革导致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根本上是由汉语的转型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正是现代汉语的发生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从语言方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是本体研究,也是历史研究。其二,从一种新的语言哲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则是从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运动。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和语言打交道并且能很熟练地运用它,但对于其中的深刻的理论则可以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五四”时期,不论是中国语言学还是西方语言学都还不发达,胡适、陈独秀等人意识到语言的力量,但对于语言何以有如此的力量,他们并没有清醒的理论认识。语言变革最终导致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但为什么能够成功,胡适、陈独秀等人当时并没有认识清楚也不可能认识清楚,这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没有研究语言学理论和当时的语言学理论在总体上的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今天的状况则不同,20世纪语言学研究取得巨大的进步,特别是语言哲学的成果使整个人文社会研究在问题以及提问的方式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语言哲学对社会科学所造成的震动